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始末

——纪念中以建交十五周年

郭白歌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友谊有悠久的历史，1950年1月以色列承认中国后，中以就开始了外交接触，两国关系曾朝着建交的目标迈进。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改变了“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开始追随美国，打乱了中以建交的步伐。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1956年中阿开启外交关系。中以关系中断并进入长达30年的“冰冻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美建交。1982年第12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非斯宣言》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中以关系逐渐解冻。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马德里中东和会加速了中以建交的步伐。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交。影响中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美、以三角关系和中国、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三角关系。

关键词 中国 以色列 建交 外交关系

作者简介 郭白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犹太研究所研究生（开封 475001）。

2007年1月9~11日，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正式访华。此次访问恰逢中以建交15周年，两国高层交往的热度进一步提升。¹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旧中国曾对犹太复国主义给予了支持，犹太人也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和以色列自1950年就开始外交接触，但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中为何迟迟不建交？这一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值此中以建交15周年之际，回顾中以建交的曲折历程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中犹友谊溯源

早在汉唐时期就有犹太人随商队从丝绸之路前来中国。^④ 一些犹太人定居在广州、泉州、杭州和宁波等港口城市，一些犹太人沿大运河和汴河来到汴梁（今开封）和其他北方城市。较多的犹太人是在北宋时期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北宋

皇帝允许犹太人定居开封，保持犹太人的传统风俗和宗教信仰，包括修建犹太会堂。此后的各个朝代也都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④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后犹太人也不断掀起来华的高潮。19世纪40年代后的几十年，一批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1/4}来到中国，大多聚集在香港和上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2}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

¹ 参见田辉：《以总理奥尔默特访华 共庆中以建交15周年》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09/content_5581071.htm 2007年1月9日。

^④ 参见彭树智主编：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3页。

^{④⑤} See Xu Xin *Chinese Policy towards Judaism*, p. 1 <http://www.jewsofchina.org>

^{1/4} 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原指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后泛指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国家的犹太人。

^{1/2}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指居住在法国北部、德国和斯拉夫国家的犹太人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后代。

内战来华谋生，哈尔滨成为他们的“安全港湾”¹；1933~1941年，逃避纳粹屠杀和迫害的犹太难民在上海找到了避难所。当时上海接纳犹太难民人数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④上海人民尽管深受战乱之苦，还尽力给予犹太难民以各种帮助。1994年4月，一批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在虹口原难民收容所旧址立起了一块铜制纪念碑，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④

旧中国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支持。早在1903年，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就建立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后，这个组织立即进行活动，希望得到中国官方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1918年12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次长陈篆致函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嘉道理，称“中国政府在对待锡安主义理想问题上持与英国政府相同的态度”。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交给在上海出版的《以色列信使报》发表，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表示赞同。^{1/4}犹太人也支持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抗日斗争。如：曾担任孙中山先生副官（后成为新中国的将军）的莫里斯·科亨、德国犹太作家兼记者的汉斯·希伯、还有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的罗生特。^{1/2}

1947年联合国在表决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同情犹太人，但另一方面又不愿得罪英国和阿拉伯国家，所以采取了弃权的做法，是当时7个亚洲国家中唯一没有投反对票的国家。1949年3月1日，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成给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发电报，宣布承认以色列国。^{3/4}5月11日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国民党政府投了赞成票。^⑧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处于崩溃的前夕，以色列也正全力投入第一次阿以战争，因此双方未能建立外交关系。

中以关系的萌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后，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致电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我很荣幸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

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和感谢”。^④以色列是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以色列当时之所以很快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以色列采取承认既成事实的做法。第二，关于滞留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命运，以及已离开的犹太移民立约移交给以色列国的一些重要的不动产等问题，以色列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第三，以色列考虑到当时自己的国土内还有一些巴勒斯坦人居住区。承认中国分裂就等于承认在加利利和内盖夫的巴勒斯坦居民区可以脱离以色列并入约旦，或者并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的缔造者们不希望开此先例。”^⑤当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以色列当时外交战略的一种表现。自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后近两年中，以色列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这样的路线，向世界各国敞开大门，摆脱外交上的孤立。¹⁰以色列虽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执政的工党带有较强的社会主义色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老一代领导人也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采取既亲美又亲苏的政治立场，承认新中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

当时中国的外交原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

¹ See Jon Campbell “Diaspora Safe Harbor Harbin, a forgotte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China”,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4, 2004, p. 34.

^④ 参见潘光：《近代以来中犹文化交流》，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3页。

^{④④} 参见彭树智主编：肖宪著：前引书，第311页。

^{1/4} [以色列]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2} 参见潘光：前引文，第152页。

^{3/4} 参见[以色列]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前引书，第44页。

^⑧ 同上，第19页。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⑤ [以色列]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前引书，第19页。

¹⁰ See Aaron Shai “The Israeli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onathan Goldstein *China and Israel 1948 – 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Praeger Publishers Westport Connecticut USA, 1999 p. 84.

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¹ 鉴于以色列没有与台湾当局“建交”,并在1950年联合国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时投了赞成票,中以之间不存在影响建交的直接障碍,1950年6月20日,两国外交官在莫斯科进行接触。6月28日,以色列政府通过辩论决定,同意与中国建交,但延期公布和执行,原因是3天前爆发了朝鲜战争。^④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改变了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开始追随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不仅加入了联合国-美国集团,还直接向在朝鲜作战的美军提供了医疗设备。本-古里安甚至要派两个营的国防军参加联合国部队,因遭到政府其他成员的反对没有成功。^(四) 以色列采取亲美的立场不足为怪。在极为关键的问题上,美国都给以色列以支持和帮助。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1分钟后就承认以色列,并给予1亿美元的援助。^{1/4} 1948~1949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美国的外交配合是促使以色列获胜的重要因素。^{1/2} 然而美国的压力和以色列在同中国建交问题上所持的消极和拖延态度,使中以两国错过了第一次建交的时机。

1953~1954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以双方再次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那时中以进行秘密联系的一条通道是双方驻缅甸的外交机构。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新任驻缅大使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取得联系,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这种对话日趋频繁,并逐渐沿着现实性与建设性的路线发展。^{1/4} 姚仲明大使致电外交部:以色列政府曾特别指示哈科恩与中国驻缅甸机构保持友好关系,并表示愿意研究以中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随后,以色列方面正式向中国驻缅甸使馆提出要求:希望派遣贸易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访问。^⑤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了缅甸,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大使哈科恩,并邀请他访华。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布:我国同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七)

1955年1月27日,以色列代表团在驻缅甸大使哈科恩率领下访华,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

长丹尼尔·列文随团访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反对以色列和中国接触。以色列政府对以访华代表团的指示是:在关于双边贸易之外的任何问题上要保持谨慎。^⑥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以色列代表团。丹尼尔·列文表示,这次是就建交的技术问题作自由交谈,不是正式谈判,因为以色列政府还没有在建交问题上作最后的决定。¹⁰ 当时以色列的领导层内分成了两派,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较量,将来肯定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上很有影响的大国,与这样的国家建交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以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为首的一派更多顾及美国的态度,主张谨慎从事。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和驻美国大使鲁文·希洛阿也认为,以中建交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利益,且会损害以美关系。¹¹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总理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¹² 中国通过万隆会议了解到阿拉伯国家抵制与以色列关系的要求。¹³ 以色列感到形势发展对己不利。1955年4月29日,丹尼尔·列文两次致电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以色列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此时中国已开始

¹ 参见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参见徐宏良:《朝鲜战争前后的中以关系(1950~1955)》载《中东研究》,2003年第2期,第19页。

^(四) See Amon Shai op. cit. p. 89.

^{1/4} 徐宏良:前引文。

^{1/2} 参见殷罡:《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背景与基点》,载《西亚非洲资料》,2001年第4期,第29页。

^{1/4} 参见[以色列]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前引书,第105页。

^⑤ 参见张伟:《1955年以色列密使来华谈建交:设立秘密外交渠道》,载《环球时报》,2006年2月17日。

^(七) 参见彭树智主编;肖宪著:前引书,第314页。

^⑥ See Suffott E. Zev, *A China diary: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 FRANK CASS, London 1997, p. V II

¹⁰ 参见徐宏良:前引文,第22页。

¹¹ 参见杨曼苏:《中以关系漫谈》,载《中东研究》,2004年第1期,第33页。

¹² 参见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¹³ See Suffott E. Zev op. cit., p. V III

调整对中东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就中以关系指示道：“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保持贸易关系。”5月21日中国外交部电示驻缅甸使馆：“我虽准备同以色列建交，但目前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关系，时机上应稍缓。”^① 中以两国建交之事就这样稍缓下来。

中以关系的中断与隔绝

万隆会议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日趋频繁。1956年中国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建交。1956~1965年，中国同十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② 1956年10月，以色列与英、法一起发动了对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埃及，强烈反对英、法、以三国的行动。^③ 中国还中断了同以色列的直接贸易。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冰冻期”。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犯下的又一次滔天罪行，也是对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以色列是美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的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④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中国在提到以色列时通常使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一词。中国还回避同以色列的接触，甚至禁止或公开拒绝邮政及电讯往来。^⑤

1960年之前以色列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其新中国的领导给予高度评价。直到1960年，以、中两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1987年以后也同样如此。但是当以共领导人了解到关于中国“大跃进”的情况后，以共开始批评和抨击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以共认为，“大跃进”是中国偏离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批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明显的沙文主义式的资本主义。^⑥ 在这种情况下，中以关系已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了，于是便处于一种相互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之中。但是，一方面由于台湾当局与不少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以色列仍希望同中国政

府改善关系，所以自1950年以色列承认新中国后，以色列一直支持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认为这样能促进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方面那些亲美的中东国家同中国仍无往来，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中东国家也往往在中苏争端中倾向于苏联。在此情况下，中国继续保持同有关中东国家的关系，支持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支持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力量，保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并依靠它们来开展反苏和反美的斗争。^⑦ 60年代中期，由于1965年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等原因，1965年以后在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以色列强烈反对驱逐台湾。^⑧ 中国支持巴解组织的立场是当时国际和中东形势的发展使然。1960~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中既要反美，也要反苏，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此时美、苏超级大国已全面打入中东地区，竞相向中东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同时利用联合国等国际讲坛进行活动。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但是，由于外交工作是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管和谨慎把关的，大致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态，中国外交得以较快地回到正常轨道上。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关于驱逐台湾、恢复中国政府合法席位的关键性表决中，2/3的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投

^① 彭树智主编；肖宪著：前引书，第316页。

^② 参见杨福昌：《发扬传统友谊 再创辉煌未来》，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9页。

^③ 参见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④ 同上，第482页。

^⑤ 参见[以色列]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前引书，第134页。

^⑥ See Aaron Shai op. cit., p. 91.

^⑦ 参见肖宪著：《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⑧ 参见[以色列]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前引书，第26页。

了赞成票。¹ 中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仍然是反对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并不反对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人民，只是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行径。^④

中以关系的中断与长期隔绝和对立主要是由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中国的对以政策，还是以色列的对华政策，都没有脱离两国对外总体战略的总框架。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国一直把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对外政策中最主要的内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始终是中国外交斗争的重要目标。而在以色列的总体外交战略中，是把同西方国家的结盟、尤其是同美国保持特殊战略关系作为它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内容。这样，中美对抗关系和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就决定了中以之间不可能接近。

中以关系的解冻

自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起，中美关系开始逐渐解冻。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④ 1973 年 12 月，埃及、以色列、约旦等国在日内瓦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启动。1982 年第 12 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斯宣言》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1/4} 《非斯宣言》是阿拉伯国家集体制定的第一个解决阿以冲突的和平方案，这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进入了新阶段，即阿拉伯国家愿与以色列和解的阶段。^{1/2}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促使中以关系长期冻结的因素开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中以关系随之慢慢解冻。

1982 年，时任中国总理访问埃及时就提出“中东各国都应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间接地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承认。^{3/4} 1984 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向议会介绍他的新政府及其提交的议会计划时提到：“我们应再一次叩响强大的中国的大门。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不应成为彼此间的外交隔阂。”本着这种精神，以色列一直努力扩大和加强同中国的秘密接触与交流，而中国在国际论坛上继续谴责以色列的同时，长期一贯不与以色列来往的政策却在悄然变化。1985 年 12

月，时任中国外长吴学谦在访问埃及期间发表声明说，只要以色列继续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中国就不与以色列当局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应该区分以色列当局和以色列人民，允许以色列专家和学者以个人身份访华，参加由一些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⑧

1985 年 5 月 27 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④ 以色列决定重开关闭了近十年的领事馆。以色列希望香港成为自己进入北京的后门，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前造成既成事实，一旦香港回归祖国，那么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自然就成为驻中国的一个外交机构。^④ 1986 年 5 月，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正式开馆。正如以色列所希望的那样，香港领事馆成了以色列商人、学者及游客来华的主要门户，也成为了以色列观察中国，中国观察以色列的前哨站。

中以建交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中以之间非官方交流的增多，两国除了通过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进行联系外，开始积极寻找通向政治领导层的渠道。其中之一就是两国外长自 1987 年 9 月以来在纽约进行的固定会晤。1988 年 9 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会晤。双方高级别的正式会晤表明了两国关系的改善，逐步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已被纳入双方高层的议事日程。

1988 年 11 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决

¹ 参见陈建民著：《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09 页。

^④ 参见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前引书，第 255 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 482 页。

^{1/4} 参见徐向群、宫少朋著：《中东和谈史 1913~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221 页。

^{1/2} 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年版，第 30 页。

^{3/4} 参见陈建民著：前引书，第 312 页。

^⑧ 参见 [以色列] 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前引书，第 123 页。

^④ 参见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前引书，第 381 页。

^④ 参见王亚宁：《中以关系正常化的演变》，载《中东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32 页。

议,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接受联合国第224号和第338号决议,并暗示承认以色列。阿拉法特于1988年12月在日内瓦发表声明,表示接受以色列,承认必须与它谈判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随后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也认可了这一立场。这一事态的发展促使中以关系进一步向前迈进。中以关系在旅游、文化和科技合作领域中取得了较大进展,为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1989年5月和12月,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的两个代表团分别访华。1990年2月该学院在北京开设了联络处。该联络处负责人是一位农业科学家,而其副手则是以色列外交部一位职业外交官亚伊尔·吉拉特(Yael Gilatt)。尽管此联络处是非官方的,但是以方从一开始就计划要将其变成未来以色列大使馆的核心,并尽快建立一些日后将制度化的中以间的重要政治联系。1990年2月中国在特拉维夫开设了由一位外交部官员领导的中国国际旅行社代表处。1991年以色列派出资深外交官泽夫·苏扶特出任该学院驻北京联络处“顾问”。他在北京联络处的工作主要是促使和加深中以之间的文化、科学、农业交流,同时为官方的政治交流与访问创造条件,推动中以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¹此时中以建交已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从外界促进中以建交的因素是1991年发生的海湾战争和马德里中东和会。海湾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阿拉伯国家反以联合阵线的削弱,美国和前苏联为加快和平进程做出努力。1991年10月马德里和会召开,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坐在一起,对中以建交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1991年11月,以色列官方高级贸易代表团访华;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访问了以色列。此时,中以建交已呈水到渠成之势。甚至阿拉伯国家也要求中以建立关系。希望中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在中东和平会议上帮助阿拉伯国家。^④1992年1月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戴维·利维访华,1月24日他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钱其琛

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宣布中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1月28日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指出“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力应予恢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四)中国在中以问题上持一种更加平衡和建设性的态度。

中以建交掀开了中以关系的新篇章。和平友好、务实对话、互利共赢的中以关系取代了过去的中以关系。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开始发挥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力。以色列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建交,这是以色列在亚洲外交的重大突破。从1991年10月马德里和会到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订原则宣言期间,与以色列恢复邦交和新建交的国家有34个。^{1/4}中以建交是当时的形势所趋,符合两国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中以建交大大促进了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的交往。

回顾中以建交的42年曲折经历,笔者认为,影响中以关系的因素主要是中、美、以三角关系和中国、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三角关系。中以建交后,美国不时地限制以色列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以之间在受美国因素影响较小的经贸、农业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关系得到迅猛发展。展望未来,只有阿以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中以关系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中以关系的发展将有助于更有效地推动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See Suffott E. Zew, op. cit., p. 137.

^④ See Ibid. p. 120.

^(四) 杨福昌:前引文,第11页。

^{1/4} 徐向群著:《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